贵州省少数民族农户家庭融资现状分析

彭雷钦¹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 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个角度分析贵州省少数民族农户家庭融资现状。研究发现, 内源融资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农户家庭融资首选, 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途径是目前外源融资的主要选择, 随着金融机构的转换职能, 未来正规金融机构将在少数民族农户家庭融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农户家庭; 融资

【中图分类号】 F327.8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背景

贵州省作为西部贫困省份, 农业是其农户赖以为主业。在这种背景下, 农户家庭需要不断的筹集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或者扩大再生产。从资金来源的途径上看, 农户融资可以分为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两类。贵州省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内源融资是其省内农户的主要融资方式, 具有原生性、低风险性和较低成本性等特征。而外源融资是指农户家庭吸收其它经济主体的闲散资金从而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融资方式, 外源融资具有规模性, 且相较于内源融资来说其融资效率较高, 可操作性也较强。

2 内源融资的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融资水平反映了整个贵州省的农户家庭的融资状况, 本文选取省内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分别是苗族、布依族和侗族, 作为研究对象, 选择汉族以及上述三个少数民族聚居程度最高的县作为调查点, 基于 2010 年贵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问卷难度最终确定的县份为桐梓县(汉族人口占 98.66%)、雷山县(苗族人口占 83.52%)、册亨县(布依族人口占 73.02%)、玉屏县(侗族人口 76.16%), 进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内源融资进行分析。

2.1 农户家庭内源融资渠道—农业剩余

目前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家庭中, 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一般以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的单位, 是指通过从事农业及相关经营性活动获取的收入。同理, 家庭经营性支出是指从事农业和相关经营活动所必要的成本与支出。本文用二者的差额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农业剩余。公式表示为:

农业剩余 $\approx$ 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户家庭经营性支出

表 1 2018 年四县农村居民涉农收入情况(单位: 元)

作者简介: 彭雷钦(1996-), 男, 江苏新沂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金融。

	可支配收入	经营性收入	经营性支出	经营性收入/可支配收入	农业剩余
册亨县	7478	2418	490	32.33%	1928
玉屏县	10534	3697	961	35.1%	2731
雷山县	8406	2909	922	34.6%	1986
桐梓县	10795	4027	1033	37.3%	2994

数据来源：根据四县 2018 年统计公报整理

从表 1 可以看出，四个县中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低的是册亨县，为 32.33%。比重最大的是桐梓县，占比为 37.3%。从整体来看，四县的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34.8%，表明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当加大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力度，增加对于农业资金的投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户家庭内源融资中的农业剩余的资金来源。

其次，玉屏县和桐梓县远高于册亨县以及雷山县，前二者的相同特征都是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较高，因此也导致了家庭的人均农业剩余高于其它两个县，表明农户家庭对于内源融资中的农业收入依赖性相对较大。与之相反，后两个县的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较低，人均农业收入也较低，因此农户家庭对于依靠内源性融资中的农业收入的依赖性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的农户家庭与“拐杖逻辑”依然相符合，即这些县的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相对较差，使得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从而造成经营性收入也相对较低，为增加家庭收入，这些农户家庭就只好用上“拐杖”，即通过非农收入来填补农业收入的不足的状况。因此，便有农业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家庭对于内源性融资的农业剩余依赖较低的情况出现。

2.2 农户内源融资—非农收入

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按照一般的统计分类方法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三类。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户家庭通过受雇于他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而获得的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则是指农户家庭通过资本运作和技术管理等方式参与相关经济活动而取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工作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对于农户家庭的转移支付以及农户家庭内部之间的各种转入。按照前述的统计分类方法，并根据四县的 2018 年统计公报整理数据可得。

表 2 2018 年四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单位：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可支配收入
册亨县	7478	3542	47.4%
玉屏县	10534	3194	30.2%
雷山县	8406	3975	47.2%
桐梓县	10795	3336	30.9%
均值	9303	3512	38.9%

数据来源：根据四县 2018 年统计公报整理

通过表 2 可以发现，首先，四个县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普遍都较大，整体平均之下的水平达到了 37.7%，远远超过了农业剩余占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此可见工资性收入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家庭占比最大的内源融资方式。分县的情况来看，册亨县和雷山县的工资性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 47.4%和 47.2%，而玉屏县和桐梓县的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较低，分别为 30.2%和 30.9%。从人均工资性收入的绝对数额来看，最高的是雷山县，为 3975.2 元，最低的为玉屏县，仅为 3193.5 元。从对于农户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来看，总体上与农户家庭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的程度大小或者劳动力的年龄等因素有关。

表 3 2018 年四县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占比(单位：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占比
册亨县	7478	3	0.04%
玉屏县	10534	15	0.14%
雷山县	8406	7	0.08%
桐梓县	10795	28	0.26%
均值	9303	13.25	0.15%

数据来源：根据四县 2018 年统计公报整理

从表 3 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较低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典型特征，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中显的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户家庭所持有的动产以及不动产的数量较少，缺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必要工具以及方式，而由于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环境较差，农村居民接触金融机构的途径较少，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以及良好的融资环境。因此提高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进而完善农户内源融资的渠道，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建设及投入的工程。

表 4 2018 年四县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及占比(单位：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财产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册亨县	7478	1515	20.26%
玉屏县	10534	3628	34.4%
雷山县	8406	1516	18%
桐梓县	10795	3405	31.5%
总计	9303	2516	26.04%

数据来源：根据四县 2018 年统计公报整理

表 4 显示，四个县的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差异较大。其中桐梓县的转移性收入占比最高，达到 31.5%，最低的雷山县仅为 18%。影响转移性收入的因素主要是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经济水平低的县通常面临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从而减少对于农户家庭的转移支付。因此，贵州省地方政府应该配合国家的政策，加大对于农户转移性支付的强度。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以及调拨专项资金对贫困地区进行扶持，这对于实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3 外源融资的现状分析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外源融资主要融资渠道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

3.1 农户家庭外源融资渠道——直接融资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融资主要由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组成。大致可以分为向亲友间借贷、钱背和私人钱庄以及“会”三个途径。

3.1.1 亲友间借贷。

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存环境较为封闭，因此熟系的人基本限于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邻里乡亲。这种由以双方信任感为基础，很容易建立起来相互的借贷关系。但这种借贷的资金数额一般比较小，借贷利率和期限都由口头进行商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因此方式比较灵活。

3.1.2 钱背和私人钱庄。

钱背是指中间人承担中介机构的角色，通过为资金供求的双方当事人牵线搭桥，并收取一定费用的组织。而钱庄则是早期旧时代的一种信用中介机构，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所保留，是由少数民间人士组织成立的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信用担保的一种组织形式。中介人作为借贷合同的见证人把资金供求双方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纠纷，中介人必须进行调解并在必要时赔偿损失。

3.1.3 “会”。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活动常与互助性融资组织——“会”有关，这种由民间习俗形成的组织，一般由一定数量的成员组成，组织形式类似于“众筹”，会员约定每间隔一段时间共同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视情况交予每一个成员轮流使用。之所以要结“会”是由于个人的资金往往是小额的，发挥的作用有限，通过将零散的资金聚集到一起并交给有需要的人使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3.2 农户外源融资渠道——间接融资

3.2.1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之一，其主要的的作用在于支持农业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但随着中国农业银行自身业务的变革，特别是 1997 年将自身的政策性业务划拨给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后，对于盈利性逐渐加强，也逐渐减少了对于农业方面的贷款，将更多的贷款投向了风险较小，利润更高的非农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县级以下的机构数量逐渐减少，

因此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农业银行的融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3.2.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目前主要负责粮食、棉花和油品类相关的贷款类业务，其业务并没有直接与农户对接。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极度依赖于中央银行的特性也使得其融资渠道单一，具有较大数目的呆账和坏账，因此也很难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发挥很好的融资作用。

3.2.3 邮政储蓄所。

我国邮政储蓄业务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其营业网点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在县级以下业务的收缩，也为邮政储蓄银行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根据测算，邮政储蓄目前在全国的网点已经超过 40000 个，其中更是有三分之二设立在农村。但近些年来，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大量的农村资金外流，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农户家庭融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2.4 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目前国内正规金融机构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机构，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业务对象就直接为农户家庭，除了开展最基本的存贷业务之外，1999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也使得小额信贷业务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家庭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融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4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融资次序

在农户家庭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同时都可以获得的情况下，其融资次序是由融资的成本决定的。

首先，外源融资主要包含了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会产生无形的人情债或难以承受过高的利息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内源融资的非农收入就成为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主要融资方式。由于贵州省少数民族农户家庭大部分都处在贫困地区，家庭的资本累积状况较差，使得农业内卷化现象凸显，耕地与劳动力失衡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大多通过出卖剩余劳动力来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

其次，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家庭中，民间借贷是外源融资首选的渠道，从信息搜集成本的角度看，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搜集借款人的征信信息需要耗费极大成本，因此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的优势就得到了凸显，由于民间借贷双方多为亲友，所以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如果没有充分交流信息，那么贷方就会通过一个更高的信息的溢价来降低自己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而从正规金融的运营成本的角度出发，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外源融资的需求相对较小，使得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

综上，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融资次序，首先是通过内源融资来增加家庭可用资金的数额，填补家庭资金的缺口。其次会通过向亲友借贷来进行融资，最后会选择高利贷的借贷方式。而由国家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的间接融资方式，由于贵州省农户家庭的金融可得性较低，从而使得国家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方式的接受度处在较低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家庭在融资方面的选择有两个，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主要来自农户家庭自身的农业剩余，是农户融资的首选，而在农业剩余较少的农户家庭中会通过非农收入来补足融资的缺口；外源融资主要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渠道。由于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特性，再加之经济水平落后和金融可得性较差等因素，使得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民间借贷的这种非正式的外源融资途径。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金融扶贫政策的陆续出台，正规金融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落户数量也逐年增加，可以预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融资渠道会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融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朱新明, 汪来田. 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区域分类分析[J]. 甘肃农业科技, 2018(09):29-34.
- [2]王静, 姚展鹏. 山西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9, 31(07):43-50.
- [3]张杰. 农村信用社改革效果探究——以山西省为例[J]. 青海金融, 2020(11):9-12.
- [4]陈丽娴.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金融问题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 30(23):106-107.